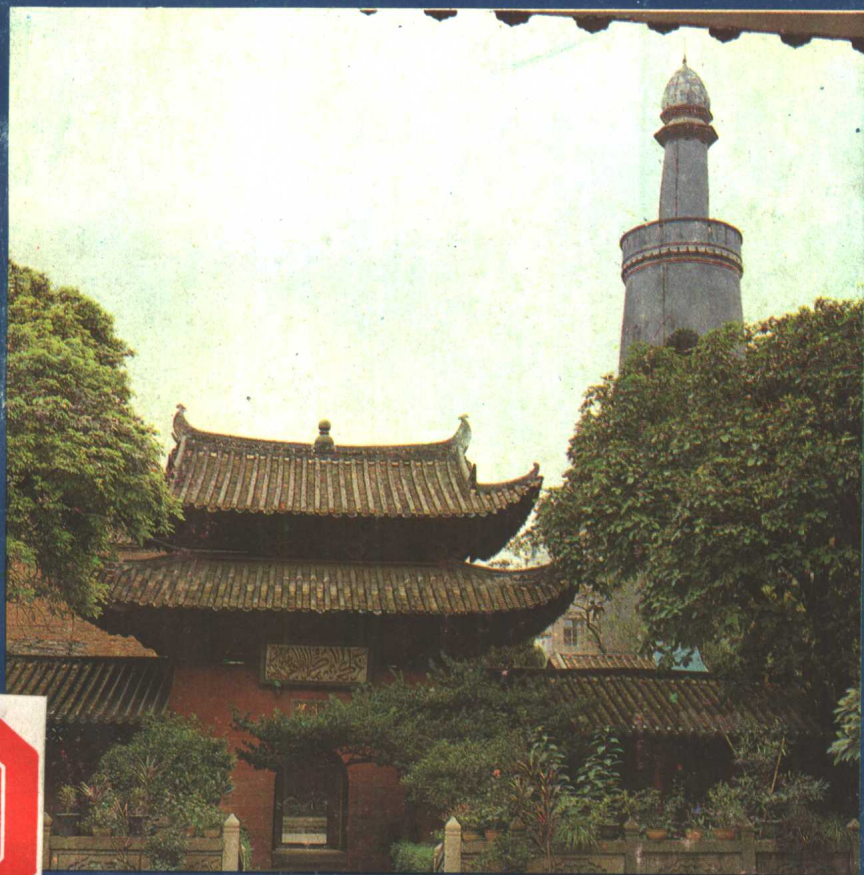


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

中元秀 馬建釗 馬逢達



寧夏人民出版社

49.5
144
1

中國伊斯蘭古跡研究叢書

廣西伊斯蘭古蹟研究

編 者

中 元 秀

馬 建 釗 (回族)

馬 逢 達 (回族)

寧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

55780

中国伊斯兰古迹研究丛书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编 者

中元秀 马建钊（回族） 马逢达（回族）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20千 插页：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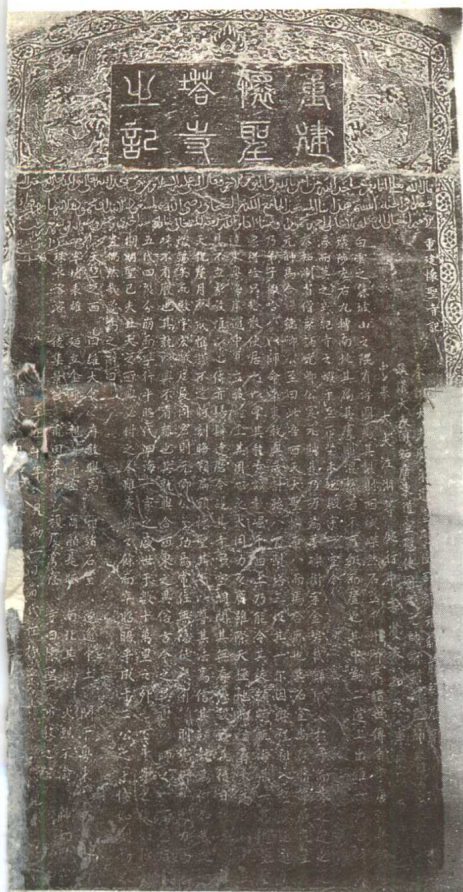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册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 庄 责任校对：沈 赵

封面设计：邢士元 版式设计：李茂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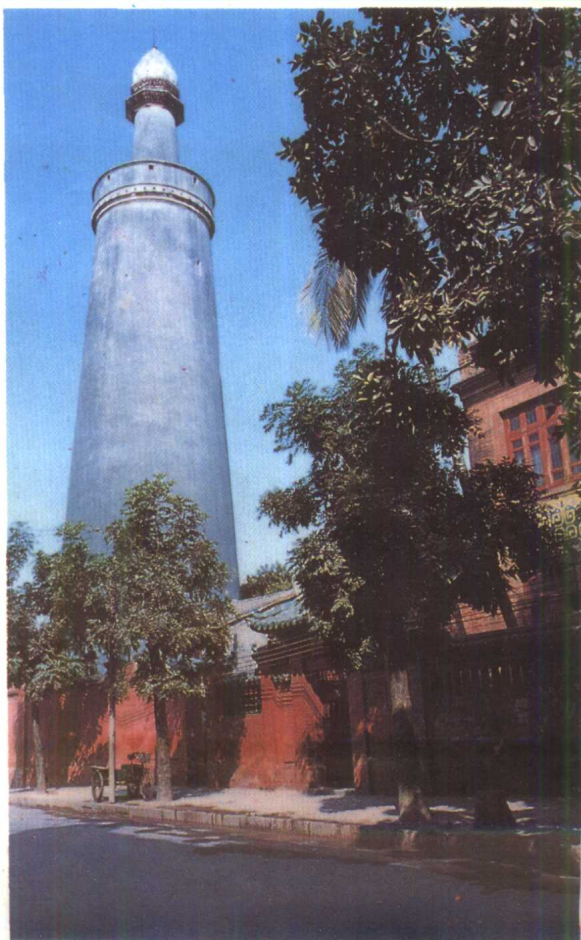
ISBN 7-227-00454-6 /K·60 定价：5.30元



图一

元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塔寺之纪》

图二 怀圣寺光塔





图三 怀圣寺礼拜大殿

图四 怀圣寺看月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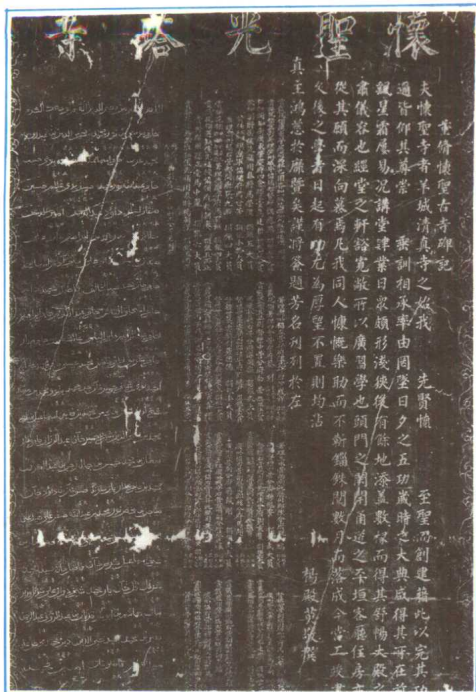
图五 怀圣寺碑亭



图六 看月楼天花板经文装饰



图七 康熙年间重修怀圣光塔寺匾



图八 同治十年《重修怀圣古寺碑记》



图九 怀圣寺门庭数进及光绪年间所立“教崇西域”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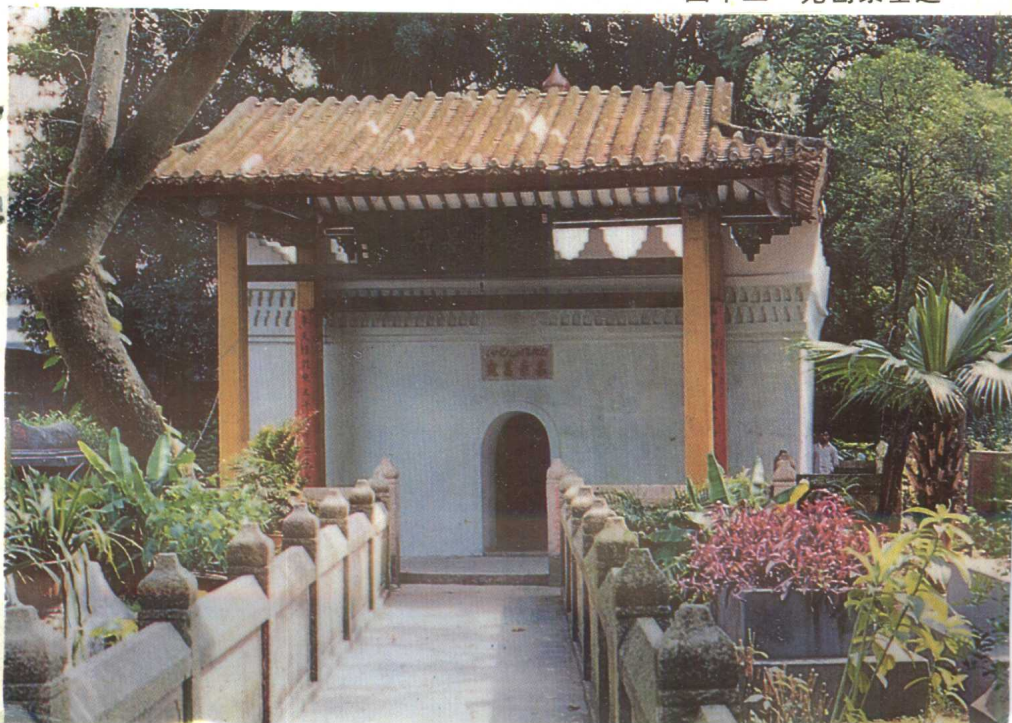
图十 怀圣寺碑廊





图十一 先贤古墓大门

图十二 宛葛素墓道



图十三 先贤古墓牌坊



图十五 元至正九年刺马丹碑



图十四 宛葛素墓





图十六 土耳其汗志·马罕默德墓碑



图十七 蕃客塔式墓盖



图十八 二十人位外籍瞻仰者
人名阿拉伯文碑



图十九

广州最大的阿拉伯文匾
——东营寺大殿匾

图二十 玛瑙巷



图二十一 廖仲凯所立回教坟场碑



图二十二 廖仲凯保护回族坟场布告碑





图二十三 麦加人尔卜当乐熙墓碑



图二十四 尔卜道拉喜墓碑



图二十五 四十位先贤之墓



图二十六 马孝贤墓碑

图二十七 法明道阿訇墓碑



前 言

广州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贸易大港。早在唐代，一条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从广州直达波斯湾，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这时，唐朝廷“设馆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史载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海舶“种类极多”“不知其数”“大舶参天”“万舶争先”一派兴旺景象。唐朝廷实施开放政策，广招海外商人，内外商旅，各国使节都从广州出入。“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是对广州外贸繁荣景况的生动写照。在纷至沓来的外商中，以阿拉伯人为最。他们把广州称为“新卡兰”，意为大中国。这些侨民“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于是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蕃坊”，就在今光塔路一带。相传唐代广州的“蕃坊”在最盛时有外商13万人之多。现今的“玛瑙巷”“大纸（食）巷”“普宁巷（旧称“普宜人巷”）”等都是当年“蕃坊”的遗迹。直至今天，这里仍然

是广州市回民的聚居地。

由于唐朝廷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来广州的外国人中，有犹太教徒、景教徒、袄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位于广州光塔路的怀圣光塔寺和位于桂花岗的先贤古墓，就是当年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留下的宗教遗迹。

这两处伊斯兰古迹的历史，是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它们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都远远超越广东一省的范围。在中国穆斯林的心目中，这是两座圣地。在穆斯林世界，它们也同伊斯兰教早期的历史相联系。毫无疑问，它们属于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圣迹之一。古寺的碑文记录着世界各地穆斯林前来瞻仰的历史：一方尚未断定年代的古碑用阿拉伯文记录了28位瞻礼者的名单：一位土耳其哈只于乾隆年间慕名前来，居住在先贤古墓达两年之久，最后在此归真，葬于先贤之侧；先贤墓旁还葬着麦加人尔卜当乐熙；在捐资重修先贤古墓的芳名碑中，有许多是国外穆斯林的名字。还有，反映中古时期阿拉伯趣闻的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位名为“辛伯达”的航海家，其原型是阿曼航海家阿布·奥贝达。阿布·奥贝达曾于公元750年，从现在的阿曼苏哈尔港起航，经过漫长的航程抵达中国广州。1980年，阿曼有20名现代航海家，进行了一次仿阿布·奥贝达的航行。他们乘坐一艘仿古双桅木船，名为“苏哈尔

号”，在阿曼国庆日起航，经过200多天航行，航程7000浬，抵达广州，再一次证实了阿布·奥贝达的航线。“苏哈尔号”全体船员在广州朝觐了广州怀圣寺。一位船员在日记中写道：“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记住，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写在烟波浩淼的大洋上，也写在我们的心里。”近年来，前来这两座古寺瞻仰的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活动家以至国家领导人日益增多。这些都说明，广州这两处伊斯兰古迹，是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古老友谊的历史见证，至今，它们仍然在谱写着中国穆斯林同世界各国穆斯林友谊的新篇章。

然而，近几年来，对这两处古迹的始创年代及其创始人，伊斯兰学术界与史学界存疑颇多，中外学者意见纷纭。有些外国学者甚至把它看作千古不解之谜。如本世纪初英国学者布鲁姆霍尔在其《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最后，我们仍然要问：‘谁是这位先祖？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都没有答案，问题很可能就如此继续存在下去。”（见by u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魏松译）在更早些时候，即公元1878年，法国学者达布里·德·梯尔桑出版了《在中国与东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教》一书，其中一章为“广东伊斯兰教史”。在此，他否定伊斯兰教在唐太宗时代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当然，关于怀圣寺建于唐贞观年间之说也在否定之列。1894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夏德的《中国史料中的伊斯兰教

国家》一书，1895年法国学者德非里拉写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起源·两部中国伊斯兰传说·马德兴麦加朝圣》这一长篇学术论文也都涉及了广州的伊斯兰古迹。德非里拉并翻译了有关宛葛素（Wakkas）的资料、翻译和研究了怀圣寺的碑文。另一位法国学者韦希尔，在1911年出版了题为《中国最古的伊斯兰建筑——广州怀圣寺》一文。上述学者的论述，有的已选入本书。还有日本学者桑原鹭藏，他在《蒲寿庚考》一书中，对南宋方信孺首次记录的“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提出质疑，极力否定广州怀圣寺唐建的可能性。他的论述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

中国史学界前辈陈垣教授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中认为，广州的先贤古墓应建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史学家张星烺教授认为，公元851年阿拉伯旅行家苏烈曼在广州见到的“回教教堂”“必即怀圣寺”，故主张唐建。他写道：“唐初海上交通甚繁，摩诃末尝知中国为东方大国，劝其弟子往中国学习科学，彼于布教之始，即遣其往来中国亦意中事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冯家升先生都认为怀圣寺建于南宋时期。白先生说：“其创建时期最早恐不过在绍熙壬子前百年之内（公元1091至1191年）。唐建之说不足信也。”（见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记〉》）罗香林教授认为怀圣寺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